



人民共和國 是一切勝利之源

中國社會科學院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离退休干部征文選集

中國社會科學院老干部工作局 編



世界科學出版社

人民共和国 是一切胜利之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
离退休干部征文选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工作局 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白小微

特约编辑：林 昶

装帧设计：林 昶

责任出版：刘 喆

责任校对：何 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民共和国是一切胜利之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离退休干部征文选集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工作局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11

ISBN 978-7-5012-3683-1

I. 人… II. 中… III. 社会科学—科学研究事业—成就—中国—文集
IV. C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9905 号

人民共和国是一切胜利之源

Renmin Gongheguo Shi Yiqie Shengli Zhiyuan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邮政编码：100010)

网址：<http://www.wap1934.com>

北京景山教育印刷厂照排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33 字数：540 千字

2009 年 12 月第一版 2009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12-3683-1

定价：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代序 继承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新的辉煌

——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60 年的成就与启示

陈奎元*

新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走过了 60 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回顾 60 年来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我们对前辈们满怀崇敬之情。在新的历史阶段,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重任在肩,要继续往开来,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努力担负起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职责,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新中国开辟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纪元

60 年前新中国的诞生,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也是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新中国的 60 年,是中国历史上改天换地的 60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同心同德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迅速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伴随新中国前进的历史脚步,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也进入了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人民意气风发,百业俱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倡导“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323 页)。1956 年,党和国家组织制定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 12 年(1956~1967 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同年,毛泽东同

* 作者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志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极大地鼓舞和激发了科技界、文艺界以及其他各界广大学术工作者的积极性。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艾思奇、李达、何其芳、孙冶方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学术大家,对创建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一时期开辟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前所未有的繁荣兴旺的新局面。

20世纪50年代后期,党内在指导思想上发生失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逐渐发展并占据主导地位,导致“文化大革命”那一场浩劫。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首当其冲,总体上陷于停滞甚至出现某些倒退。这场严重的失误和劫难,不但打断了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波澜壮阔的发展进程,也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威信,损害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这个恶果是尤其严重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党中央大力倡导解放思想,恢复并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进入繁荣发展的新阶段。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科学和教育提到战略高度。邓小平同志强调“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他还具体地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要赶快补课。1977年,党中央作出了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决策。1983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立。198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正式设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江泽民同志指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等重要”,“我们必须始终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加快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并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赋予哲学社会科学新的定位和使命。2004年,党中央颁布《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组织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党的十七大提出,要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

60年来,新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同党和国家的大局同步,取得了不平凡的业绩。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队伍日益壮大。新中国初期,党和政府创办的首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只有近代史、考古、语言、社会四个研究所。1955年,中国科学院设立哲学社会科学部,相继成立了哲学、文学、历史、经济、法学、考古、语言等15个研究所。1977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此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

也都建立了地方社会科学院,形成了高等院校、社会科学院、党政部门所属研究机构、党校行政学院、军队院校五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系统;现在从事哲学社会科学教研工作的人员近40万人,其中有高级职称的人员10多万人,专职研究人员3万多人。

学科体系不断健全。新中国成立不久,党和国家即将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教材体系和研究体系的建设提上日程。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断加大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体系的投入,建设起一批有较高的理论水准和创新能力的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以及立足学术前沿的新兴学科相交叉学科。到目前为止,共有20个一级学科、400多个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原理、历史学、考古学、哲学、文学、语言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人口学、民族学与人类学、宗教学、政治学、新闻学、军事学、教育学、艺术学和国际问题研究等等学科构成了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学科体系。

学术研究硕果累累。党中央设置专门机构,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这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中的重大基础工程。20世纪60年代初,为改变此前以苏联教科书为教材的状况,组织编写和出版了一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代表各学科最高研究水平的教材,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以及《形式逻辑》、《文学的基本原理》和《美学概论》等;整理、出版了大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翻译出版了许多外国理论、文史、艺术著作。改革开放以后,又推出一大批重要科研成果和著作,如《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通史》、《中国史稿》(22卷本)、《现代汉语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研究丛书》、《中华大藏经》等等。这些成果异彩纷呈,显现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景象。

服务党和国家大局的能力不断增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投身党和国家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新中国初期,他们围绕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政治制度建设,对农业合作化、商品经济、价值规律、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和社会主义改造等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哲学社会科学界踊跃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研究和讨论,积极参与全党恢复并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不断强

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社会科学研究与应用显示出强大的影响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依法治国方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重大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方面,都可以看到来自社会科学界的贡献。党的十六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目标,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对外学术交流逐步扩大。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难以全方位开展对外交流。在新的历史时期,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我国将对外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社会科学的各领域也对世界敞开了大门。我国学术机构对外学术交流遍及世界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增强。

总之,60年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认真总结和学习 60 年来我国哲学 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经验

6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走过了不同寻常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表明中国在社会科学领域升起了自己的旗帜。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显现出根深叶茂的繁荣景象,同时积累了非常可贵的经验。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和理想,也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党中央一贯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胡锦涛同志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决不是教条式地搬用,或者脱离实际地从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去作抽象推论,或者用它的个别结论去代替具体的科学研究,而是要深刻领会它的精神实质,善于运用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要走自己的路,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反对各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以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为中心,进行理论研究与创新。

全面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指南。

实践证明,要促进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必须鼓励科研人员大胆探索和创新,允许不同观点、不同学派进行讨论和争鸣,提倡充分说理的批评与反批评,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社会科学的理论与党和国家的大局息息相关,学术研究要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统一,必须自觉地维护而不是干扰安定团结的大局,必须坚持而不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贯彻“双百”方针,归根到底是为科技文化的进步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鼓励支持科研人员在实践的基础上参与理论创新,探索新领域,创立新学说,以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促进国家的兴旺发达。

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我们党在历史上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熏陶和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闭门造车,必须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做群众利益的代言人。如果脱离党和人民的伟大实践,凭一点书本材料和便利的工具去构筑自以为是的“理论体系”,或者改头换面、变相抄袭、人云亦云,这样的所谓“研究”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胡锦涛同志指出:“理论研究只有同社会发展的要求、丰富多彩的生活和人民群众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才能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这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根本要求,也为广大社科工作者的自身建设指明了方向。

吸收借鉴古今中外优秀的思想理论成果。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学习借鉴国外优秀的文明成果,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对于中国古代和外国的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一切照搬都不是科学的态度。近些年来,理论学术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积极进行理论创新,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有值得关注的倾向:一种倾向是对某种传统文化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例如把在封建社会具有独尊地位的儒家学派变成宗教,把儒家伦理思想奉为代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念;另一种倾向是对西方思想理论照抄照搬,甚至企图把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和社会政治制度全盘照搬到中国来。这两种倾向都要不得。对于中国古代和当代世界理论文化的学习与借鉴,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针,要为我们自己的理论服务。

加强和改进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核心领导力量和坚强的政治保证。在西强我弱的世界格局中,在敌对势力不停顿地对我国实行西化、分化的背景下,在国内日新月异的改革进程中,只有牢牢坚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正确领导,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才能健康发展。削弱党的思想领导,放任指导思想多元化,就会产生思想混乱,甚至导致严重的社会动乱。60 年来的事实证明:如果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就没有哲学社会科学全面发展繁荣的局面。对哲学社会科学加强领导,不是要压制学术民主和独立思维,而是要在加强政治意识和组织领导的同时,支持思想解放、自主创新。全党上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全面贯彻“双百”方针,才能有力地推进改革创新,形成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当今世界和中国都在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垮了单极世界的罗网,促进世界多极化正在成为全人类的现实选择。面对深刻急剧的变化,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重温列宁的一段话。他在 20 世纪初讲道:形势变化“极其剧烈的震动,这就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要产生‘重新估计一切价值’,重新研究各种基本问题,重新注意理论”(《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2 卷,第 281 页)。眼下正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冷静观察世界、重新审视各种理论的时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应当乘此时机进一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开创自主创新的新局面。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前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表明,历史并不青睐单极世界。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喧嚣一时的“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等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政治主张并不是“终极”真理,更不能作为中国意识形态和改革发展的取向。60 年来中国的强盛与进步,30 年来改革发展的成就,不是西化的成果,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具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在当代中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是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这是根本的立场,也是不可动摇的方向。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大局,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是哲学社会科学根本任务,也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途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认真总结改革发展中的成就与问题,实事求是地分析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深切理解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对古典的和当代的各种经济、社会理论的一次大检验,也是对当代各种社会制度的一次大检验;深入研究这场危机的性质和原因,可以更加透彻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进一步树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信念,从而更加自觉地把握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造福中国人民作出有效的努力。

解放思想,自主创新,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党中央提出大力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必须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吸收世界文明的先进成果,在新的实践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要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就必须有自己的根基、自己的灵魂和自己的风格,而不是自暴自弃,甘做他人的附庸。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成果应当体现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厚重的民族精神,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相结合,牢固地树立自己的核心价值 and 话语体系。必须以研究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独立自主地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

放眼世界,自信自强,积极跻身国际哲学社会科学的行列。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出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的分量、思维成熟的程度和对人类社会探索的广度深度。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有强项也有弱项,既不应盲目自大,也不应妄自菲薄。我们的宝贵财富是拥有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世界文明史和 21 世纪的发展进程中独树一帜。我们不拒绝接受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也决不贬低自己的信仰、决不鄙薄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和革命前辈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参与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

鸣,善于在同各种学派的对话交流中取长补短,提升我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增强在国际学术中的话语权,真正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

出人才,出成果,建立高素质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60年来,一代接一代的学者铭记他们的功绩。在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提出建设一支宏大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学贯中西、具有广泛影响的思想家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前景光明之所在。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对历史机遇,理应自强素质,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在增强实践能力上下工夫;在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长才干,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关心人民群众疾苦,做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当今时代,是应该产生也能够产生重大理论成果的时代。要努力营造产生学术领军人物和学术大师的良好环境,形成人才辈出的繁荣局面。

抚今追昔,我们为新中国60年的辉煌成就而感到骄傲。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曾豪迈地宣告:“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5页)60年来,这个豪言壮语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认清使命,抓住机遇,发奋进取,为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原载《求是》杂志2009年第14期)

前 言

编委会*

60年前的10月1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巍峨的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声音传遍世界,全世界为之震动!这声音传遍祖国山山水水,全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扬眉吐气,无比自豪!

60年,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长河中,真可谓弹指一挥间。但这60年,在中国大地上却发生了波澜壮阔、翻天覆地的变化,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旧中国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已经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经把满目疮痍的旧国家建设成繁荣昌盛、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新中国。中国巨龙正在腾飞,像东方的启明星冉冉升起。

在全国各族人民、各条战线的人们,兴高采烈地以自己奋斗的业绩为迎接人民共和国60华诞忙碌着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离退休的老同志、老专家学者,更是兴奋不已。这些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亲历者、参与者,有些还曾为新中国的诞生与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的老同志,他们写诗词、作书画、写文章,歌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歌颂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就,描绘祖国河山的新面貌、新气象,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回忆自己随着祖国发展而成长的历程及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奋斗的业绩。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工作局洞悉老同志、老专家学者的心声和情感,及时地为老专家学者、老同志提供了多种抒发情怀的平台,分别编辑出版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诗词集、书画集、文集,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体育运动比赛和歌咏、舞蹈活动,举

* 单天伦执笔。

办了系列报告会、讲座和座谈会等。我们编辑的这本《人民共和国是一切胜利之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离退休干部征文选集》，即是其中的一项。

这本文集选收了 61 名作者的 58 篇文章。作者中有曾经担任院、所领导和从事党务、科研管理工作的老同志，更多的是长期在科学园地里辛勤耕耘的老专家学者。其中有 4 位学部委员，11 位荣誉学部委员，28 位原院、所（局）领导。这些文章，都是作者以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或是从宏观上，或是以一个具体事例，或是将个人的成长、成功、成就融入国家建设发展中，讴歌党的领导，赞颂 60 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荣誉学部委员何振一的《波澜壮阔的历程 辉煌伟大的成就——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一文，全面地、历史地、满怀激情地颂扬了新中国 6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取得的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文章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为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中国取得了飞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从 1978 年的 3645 亿元增长到 2008 年的 300670 亿元，增长了 82.5 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381 元上升至 2008 年的 22698 元，增长了 59.6 倍，人均国民收入从 1978 年的 190 美元上升至 2008 年的 3292 美元，已经从人均低收入国家行列跃升至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三位。文章对改革开放前 30 年作了具体的、科学的分析，既严肃地指出由于越来越严重的“左”的思想影响造成的错误、挫折，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和破坏，又实事求是地把 1949～1978 年划分成几个阶段加以总结和阐述。1949～1952 年取得了令世人折服的两个伟大胜利：其一是成功地治理了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和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不法资本家的扰乱和破坏，恢复了国民经济，安定并初步改善了民生；其二是打败了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仍然取得了光辉成就，1952 年比 1949 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145.1%，年均增长 34.8%，农业总产值增长了 53.5%，年均增长 15.3%，主要农产品产量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1953～1957 年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一年于 1956 年完成，社会总产值从 1952 年的 1015 亿元增加到 1956 年的 1639 亿元，年均增长 15%，

农业总产值从 461 亿元增长到 610 亿元,年均增长 8%,工业总产值从 349 亿元增长到 642 亿元,年均增长 21%。遗憾的是,在大好形势下,滋生了“左”的思想,以致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严重挫折甚至破坏了经济社会的大好发展势头,出现了“文化大革命”初两年国民经济负增长。但是,由于党和人民群众对“左”的破坏进行了各种方式的抵制,社会主义建设依然艰难地进行着,“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 6%,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也取得了重要成就。总之,改革开放之前 30 年,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十分曲折,发展的势头也因“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减慢了许多,但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在前进着,自 1952~1978 年,按可比价格计算,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了 7.9%,国民收入年均增长 6%,其增长速度不仅比新中国建立前快得多,也大大快于同期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从“一五”开始实施的 156 个重大项目及 694 个大中项目为开端,发展到 1978 年,已初步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为改革开放后 30 年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文章令人信服地阐述了改革开放前 30 年和后 30 年的关系,热情地赞颂了 60 年取得的“辉煌伟大的成就”。

学部委员周叔莲的《在工业化进程中研究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一文,论述了在我国实现工业化进程中,正确处理好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经过不断地探索和不懈地努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发展模式。文章作者从 1953 年开始,就深入农村调查研究,1956 年开始研究工业化中的农业问题,探索农业与工业如何协调发展;嗣后又从发展工业的角度研究工业农业协调发展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初研究范围扩大到研究城乡关系,此后一直致力于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研究,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贡献自己才智。他高度称赞党的十七大把“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深信只要认真贯彻这个战略措施,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一定能完全胜利实现。

付崇兰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迈进新阶段》和陈家勤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金融体制改革方向——从国际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教训》,阐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两个重大问题。前者讲的是城镇化和城镇化发展道路问题。文章指出,城镇化是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的必由之路。工业化、城镇化生长一般呈现出初期缓慢、中期快速、成

熟期趋缓的规律。我国现阶段已进入工业化中期、城镇化快速期、国际化提升期。文章总结列述了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五大特点之后,指出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道路,并提出现阶段应该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城乡统筹发展,强调这是新阶段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城乡统筹,正确处理好三者的区域合理布局,是实现综合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后者讲的是我国原来的金融体制必须改革,要循序渐进地向现代化金融体系迈进。但国际金融危机也告诉我们,国际金融体系也必须改革,加大对发达国家储备货币发行的监督,促进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设,以规避危机的发生。事实告诫我们,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体制改革方向。

60年来,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道路经历了曲折探索到快速发展,不仅为经济学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也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荣誉学部委员汪海波的《我对经济学所做的一些探索——为纪念国庆60周年而作》,比较详尽地列述了他从1956年工作以来通过对经济学研究的不懈努力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作者严肃地检出受“左”的思潮影响政治倾向和内容都有错误的作品,这种严格的、坦诚的态度,是科学工作者的珍贵品格。作者的大量成果是研究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战略和政策的,既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咨询,也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荣誉学部委员张守一的《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王松霏的《推进农村经济学和创建发展生态经济学60年》、刘天福的《我国创建的一门新兴学科——农业技术经济学》等,阐述了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对传统经济学提出新的要求而发展起来的新学科,也是经济学向着更加精细精确方向发展的结果。虽然这些学科发展的成熟程度不尽相同,但它们对促进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发挥着积极作用,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完善学科自身的理论、方法、体系。

荣誉学部委员吴家骏的《〈访日归来的思索〉——改革开放初期工业领域和科学管理领域的开山之作》,是一篇内容充实、极具启迪意义的随笔,记述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为了研究借鉴国外经验,中央决定派高层代表团出国考察。最早出访的大型专业考察团,是由时任国家经济

委员会主任袁宝华为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为顾问的“日本工业企业管理考察团”。该团由23人组成,大多是省、部和大企业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除邓力群之外,还有马洪、吴家骏、孙尚清。考察为期一个多月,从1978年10月底至12月上旬。访问结束后,代表团一致认为:我国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大有希望,但要花大力气。回国后及时向中央作了详细汇报。社科院的四位同志在社科院作了四场专题报告。邓力群作《访日归来的思索》报告,马洪、吴家骏讲日本的工业和企业管理,孙尚清讲日本的技术引进。报告引起强烈反应。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要求下,以邓力群报告题目为题结集出版了《访日归来的思索》一书。书的篇幅不长,但引起了很大反响,报刊评介很多,被舆论界誉为“改革开放初期工业领域和科学管理领域的开山之作”。文章强调不仅要引进先进设备,更重要的是要引进技术和学习借鉴先进的管理方法,并列举了许多生动事例,读了让人自然要思考许多问题,思路会活起来,眼界会变得宽广。

学部委员田雪原的《瞻前顾后的关键决策——1980年中央人口座谈会前后》一文,详细记述了他参与制定国家人口政策的全过程。让人们知道国家在制定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政策法规时,是如何从实际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听取专家意见,反复论证,瞻前顾后,深思熟虑,审慎周密地作出来的,加深了人们对政策、法规的理解,提高了执行政策、法规的自觉性。

规划可以更加自觉地、有组织地、有效地推动科学更快发展。周年昌的《有关新中国成立以来三次历史学规划制订情况的回忆》,比较详细地记述了1956年制订“哲学社会科学12年(1956~1967)远景规划”(历史学部分)、1978年制订“中国史学八年(1978~1985)发展规划”(古代史部分)和1982年制订中国古代史“六五”规划的情况。从该文中可以看出,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科学发展规划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被广泛地发动起来参与其中,著名历史学家和学术大师更是“规划”的直接制订人。文章在叙述“规划”制订过程之后指出,三次“规划”“时间相隔近30年,所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虽然不同,但从规划的指导思想、研究方向和目标要求、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等方面,都一脉相承,前后贯通”。“经过广大史学工作者长期不懈的努力,规划中的许多重大项目如各种通史、断代史、《中国历史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大辞典》、《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

成》等都陆续完成,原来薄弱的甚至缺门的经济史、文化史、政治史、边疆史地、中外关系史以及科技史、农业史等等,也都逐步开拓并取得重要成果”。周文讲的仅仅是历史学古代史部分的三次“规划”情况,其实当时对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如哲学、经济学、法学、考古学、文艺理论、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档案学、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教育学、军事学、包括历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中国近代史、中国当代史、世界史,还包括当时尚空缺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政治学、社会学等,都进行了这样的“规划”工作(包括1978年制订的“八年规划”和1982年制订的“六五规划”)。通过周年昌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管中窥豹,推晓哲学社会科学整个规划工作。

学部委员刘庆柱在《1949~2009: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而作》中,道出了考古学界的心声。文章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专门的考古科学研究机构,没有培养考古专业人才的学校,没有定期的考古学刊物。”他感慨地说,我在大英博物馆、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参观、考察时,看到许许多多“流失”海外的文物,其中相当数量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的西方“考察队”、“探险队”为其“提供”的。中国的考古发掘工作从1926年李济、袁复礼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主持发掘时才开始,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河南殷墟进行考古发掘才算是有国家学术机构进行考古发掘研究,可1938年因日本侵华战争而被迫中断了。1929年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遗址发现北京猿人化石,曾引起世界的轰动。此外虽也做了一些考古工作,但规模不大,收获甚微。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状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50年成立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国家级考古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在考古所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派有考古工作队开展田野工作。近20多年来,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文物考古研究所,不少地市(省辖市)也建立了考古机构。有30所大学建立了考古系、考古专业或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形成了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教育体系。出版有《考古》、《文物》等四种国家级刊物,有《华夏考古》、《中原文物》等十多种省级刊物。已经出版从旧石器时代到元明时期,涵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百部的田野发掘报告,学术论文、专著为数更多。一些规模宏大、学术意义重大的著作,如《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合集》、《中国